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

(第二辑)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美] 约翰·N·德勒巴克 编
[美] 约翰·V·C·奈
张宇燕 等译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dited by John N. Drobak
John V. C. Nye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

经济科学出版社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

第二辑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dited by Jogn N. Drobak

Jogn V. C. Nye

[美] 约翰·N·德勒巴克 编

[美] 约翰·V·C·奈

张宇燕 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 (美) 德勒巴克主编; 张宇燕译.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3. 1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 第 2 辑)
ISBN 7-5058-3324-3

I. 新... II. ①德... ②张... III. 新制度经济学 - 研究 IV. F09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106372 号

John N. Drobak

John V. C. Nye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Copyright © 1997 by ACADEMIC PRESS

© 2003 年中文简体字版版权由 Academic Press 出版公司

授予经济科学出版社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图字: 01-2000-2402

责任编辑：沙超英
责任校对：徐领弟
版式设计：代小卫
技术编辑：董永亭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美] 约翰·N·德勒巴克 编
[美] 约翰·V·C·奈
张宇燕 等译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036
总编室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esp.com.cn

电子邮件：esp@esp.com.cn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河北三佳装订厂装订

850×1168 32 开 14.75 印张 380000 字

2003 年 1 月第一版 2003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7-5058-3324-3/F·2675 定价：34.6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第二辑

(按姓氏笔画排列)

刘 伟 张 军 张宇燕 张维迎 张曙光
李风圣 杨小凯 杨瑞龙 汪丁丁 易宪容
林毅夫 钱颖一 梁小民 盛 洪 樊 纲

策划：沙超英

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

(第一辑)

《专业化与经济组织》

[奥] 杨小凯 黄有光 著

《所有权、控制与企业》

[美] 哈罗德·德姆塞茨 著

《交易成本经济学》

[美] 迈克尔·迪屈奇 著

《产权经济学》

[南] 斯韦托扎尔·平乔维奇 著

《反托拉斯经济学》

[美] 奥利弗·E·威廉姆森 著

《契约经济学》

[美] 科斯 哈特 斯蒂格利茨 等著

拉斯·沃因 汉斯·韦坎德 编

(第二辑)

《制度、契约与组织》

——从新制度经济学角度的透视

[美] 科斯 诺思 威廉姆森 等著

[法] 克劳德·梅纳尔 编

《新制度经济学前沿》

[美] 约翰·N·德勒巴克 编

约翰·V·C·奈 编

《经济演化》

——探究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荷] 杰克·J·弗罗门 著

《制度变迁的经验研究》

李·J·奥尔斯顿

[美] 思罗因·埃格特桑 编

道格拉斯·C·诺思



博士书架

经济学方法论译丛

《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

[奥] 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著

《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

马克·布劳格 等著

[英] 罗杰·巴克豪斯 编

《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

[美] 劳伦斯·A·博兰 著

《均衡与理性》

——决策规则修订的博弈理论

[美] 保罗·魏里希 著

《经济学方法论新论》

——超越经济学的唯名论与唯实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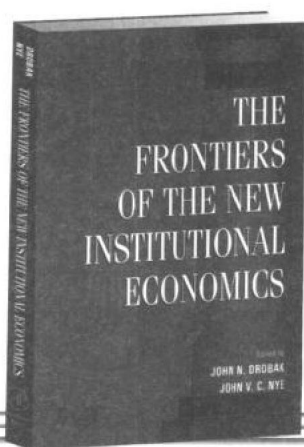
托马斯·A·鲍伊兰

[美] 帕斯卡尔·奥戈尔曼 著

The Frontiers of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dited by Jogn N. Drobak

Jogn V. C. Nye



出版前言

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轨时期，在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过渡的进程中，我们遇到了很多的矛盾和问题。如何设计好一个制度是中国必须解决的最为紧要的根本问题。因为制度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不仅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基本问题，这一命题也为我国的改革实践所证实，“改革就是解放生产力”这一论调解读的就是制度的重要性。体制改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鼻祖科斯的理论，在教育成本大于零的条件下，产权与资源配置效率有关，改革实际上就是通过制度的重新安排来降低交易费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所以无论从学术还是从实践两个角度了解与学习新制度经济学都非常有意义。

改造世界，首先需要认识世界。认识世界的第一步首先是要学习。现代知识浩如烟海，学习就要有选择。新制度经济学是最近 30 年来才成为一个热门的研究领域。可以说，新制度经济学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阿罗-德布鲁范式的革命。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在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中，市场交易是无代价的，资源配置可以借助“看不见的手”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状

态。然而新制度经济学证明，在现实经济运行中，最重要的约束变量不仅是生产成本，而且还包括交易成本，用张五常的话说，就是制度成本。新制度经济学告诉我们，一个节省交易成本的制度安排、制度框架和制度创新的空间是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的基础制度安排、制度结构、制度框架、制度环境和制度走向决定了它的经济绩效。

考虑现实经济中的交易成本问题，至少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使人们认清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缺陷和问题之所在。二是打开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基础上发展经济学一般理论的空间。在最近20年中凡是对经济学理论具有重大发展意义的，无一不是与对新古典经济学范式假设的修正有关。三是对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对中国转轨时期的改革，具有最直接的指导意义。这种指导价值不只在于解释中国正在发生的变革，诠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意义，而最重要的在于告诉人们这种制度变革、制度演进对于未来中国的发展趋势会形成什么样的影响？会产生何种结果？最近几年，国内一批中青年经济学家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式探讨中国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这表明新制度经济学在我国有着良好的应用前景。

最近十多年来，国外出版了一大批有关新制度经济学的学术专著，我们聘请有关专家从中精选了一批处于该领域的学术前沿，同时有可能在我国有较高应用价值的著作，以便让我国读者通过这套《新制度经济学名著译丛》能及时掌握国外新制度经济学的最新发展动态，拓展视野及理论思维空间，在吸收、借鉴有益的理论观点及研究方法的同时，探索出适合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理论，以指导中国的实践，解决中国的问题。

本丛书的第一辑出版以后，受到经济学界专家学者们的普遍关注与认同，并纷纷推荐近年来国际该领域有影响的图书希望我们继续出版第二辑，但由于我们出版能力有限，难以都收集到这套丛书中，特在此表示深深的歉意。

本丛书在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编委们的鼎力支持和译者们的大力配合，让我们感受到了学者们对发展中国经济理论寄予的希望和责任，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我们排除万难，再次推出第二辑以飨读者。由于本丛书是国外经济学界著名人士的著作及文集，其思想均代表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在翻译过程中基本尊重原文，希望读者有选择地学习与借鉴。同时希望读者们对本丛书存在的问题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帮助我们把书出好。

译者序言

1995年3月，为了纪念道格拉斯·诺思教授1993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华盛顿大学召开了一次研讨会，与会者提交了许多论文。《新制度经济学前沿》就是以这些论文为基础编成的文集，共收录了14篇论文。这些论文分为四个部分：（1）理论基础；（2）经济史；（3）制度和政治经济学；（4）学习、认知和理性。

正如该书主编德勒巴克（John N. Drobak）和奈（John V. C. Nye）在《引论》中指出的那样，“新制度经济学”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术语。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如法律、政治、历史等，但是他们所采用的基本方法却是新古典的价格理论。正是因为这一点，新制度经济学才能够被主流经济学接受。如果说以凡勃伦（Veblen）和康芒斯（Commons）为代表的旧制度主义旨在批判主流经济学并试图建立一个不同的框架的话，那么新制度经济学则试图充实完善主流经济学。

德勒巴克和奈认为，那些被贴上“新制度主义者”标签的

学者（其中，有些学者并不把自己看做是“新制度主义者”）一般集中于四个研究领域：交易费用和产权；政治经济学和公共选择；数量经济史；认知、意识形态和路径依赖的作用。那些自认为研究“新制度经济学”的学者通常关注两方面的问题：（1）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增长；（2）制度如何起源。例如，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思想就是采用新古典的经济理论，解释政府、法律、市场、企业、社会传统、家庭等政治、历史、经济和社会制度，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产物^①。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制度经济学并没有突破新古典经济学。但是最近十几年中，新制度经济学家的研究范围大大扩展了，并进入到了学习、认知等心理学领域，因为他们怀疑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假定是否恰当。在这一点上，他们与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等人的研究主题非常接近。



这本书的理论基础部分是对诺思主要经济学贡献的总结与概括。在《绪论》中，诺思对自己的整个研究历程进行了回顾；在《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一文中，与诺思分享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W. Fogel）对诺思的经济学贡献进行了客观中肯的评价。鉴于诺思的贡献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理论基础之一，对诺思研究历程的回顾也就是对新制度经济学主要理论发展脉络的回顾。

诺思指出，他的研究目的是要解释不同经济体贫穷或富裕的根源。为了全面深入回答这一问题，诺思涉及的研究领域包括从马克思到现在的认知科学。在自传中，他曾经写道，在加州大学

^① 这个看法来自芝加哥大学网站上对各种经济学派别的主题、代表人物等所做的介绍。

伯克利分校读研究生时，对他影响最大的三位老师之一，雷奥·罗金（Leo Rogin），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另外两位是罗伯特·布雷迪（Robert Brady）和 M. M. 奈特（M. M. Knight，Frank Knight 的兄弟）。

一般认为，新经济史学开始于 20 世纪 50、60 年代。其中，1957 年在麻省威廉姆斯滕（Williamstown）举办的研讨会和 1960 年在普度大学（Purdue）的研讨会成为重要标志，在普度会议上，与会者致力于发展经济理论和数量方法并将其用于经济史。但是，诺思在解释经济史的时候，发现当时理论存在严重不足。新古典理论只是一个静态模型，缺乏过程分析和动态分析；旧制度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是没有系统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但并非十全十美。在这种情况下，诺思试图发展一套理论以便对经济史进行解释，这就是诺思的新制度经济理论。那么，为什么把问题集中于制度呢？这是因为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市场的有效性直接决定于制度框架。

1971 年，诺思和兰斯·戴维斯（Lance Davis）发表了《制度变迁与美国经济增长》。在这本书中，诺思用制度变迁来解释美国经济增长；1973 年，他和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P. Thomas）发表了《西方世界的兴起》，用制度变迁理论对欧洲经济史进行解释。在这两本书中，诺思都强调“**制度是重要的，并且总是有效的**”这一观点。但是，他 1982 年出版《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时，放弃了“制度总是有效的”观点，并对无效制度能够长期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此后，其观点变为：**制度是重要的，但并不总是有效的**。

1983 年，诺思到位于圣路易斯的华盛顿大学工作，并创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中心，采用经济学的方法研究政治学的基本问题。1991 年，诺思发表了《一种政治学的交易成本理论》，在文中，他采用交易成本分析方法，提出了政治市场天生就不如经济

市场有效的观点。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诺思一直致力于发展一种长期制度变迁的框架。他在 1990 年出版了《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在这本书中，他对许多概念进行了非常明确的界定，例如，他明确区分了制度和组织，分析了制度的三个构成要素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本书可以被看做是诺思对其长期思考的制度变迁理论的一个系统总结。

进入 90 年代以后，诺思对经济学的“理性”假定产生了怀疑，因为“需要对人们为什么做出那样的选择进行解释”，需要对意识形态为什么能对人们的选择施加影响、并引导长期经济演化路径做出解释。因此，认知科学、学习如何进行等问题就成为诺思 90 年代以后的主要研究领域。只有对这些问题做出解释，才能推动社会科学的进步。

在《道格拉斯·诺思和经济理论》这篇文章中，罗伯特·福格尔首先对经济史在经济理论中的作用、经济理论和数学模型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福格尔认为，把经济理论和经济模型相提并论或混为一谈是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悲哀。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之前，人们把对经济理论的研究称为“经济学理论”；而把处理经济行为的数学模型称为“数理经济学”；评价经济理论好坏的标准是这种理论的经验效果，而不是形式是否优美。

在经济学说史上，许多开拓性人物都非常注重经济史的作用，历史成为他们理论的一个主要源泉。甚至许多精通数学的经济学家也如此，例如古诺（Cournot）、马歇尔（Marshall）等人。但是，当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提出“经济史是经济学良好训练的根本所在”时，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对此感到迷惑不解。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往往把经济模型和数学等同起来。但是，数学并不是建立经济模型的惟一手段，文字表述同样可以建立抽象的经济模型。数学模型有两个优点：（1）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分析工具；（2）经过数学推理，可以发现逻辑

和经验错误，并对那些没有经过严格逻辑推理的结论提出挑战。因此，在探究经济学原理时，数学和历史并不对立，而是互补的。

福格尔认为，20 世纪的经济学家中，在运用历史来发展经济理论方面，可以和诺思相提并论的有三位：约瑟夫·熊彼特、库兹涅茨（Kuznets）、西奥多·舒尔茨（T. W. Schultz）。在利用经济史发展新制度经济学方面，诺思确实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福格尔看来，诺思最主要的成就在于：（1）提出制度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2）提出制度形成的交易成本对制度安排有重要影响；（3）明确区分组织和制度；（4）提出偶然性在制度变迁中可以发挥决定性作用。另外，诺思对理性假定的修正也大大扩展了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假设前提。

福格尔还研究了诺思的著述在网络数据库中被引用的情况。他发现，诺思不只在经济学领域有重要影响，在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管理科学、公共管理等领域都有重要影响，其著作被广泛引用。

二

“经济史”部分包括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都是通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提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命题或验证发展已有的新制度经济学结论。

诺思认为，制度并非固定不变，也并非外生。制度变迁从根本上解释了为什么有的经济一直贫困，而有的经济却走向繁荣。一般而言，一个国家能否建立一项合理的产权制度，取决于该国的财政政策（Fiscal Policies），而战争是决定现行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代早期欧洲战争和税收的政治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历史教训》一文中，霍夫曼（Philip T. Hoffman）和罗森塔尔（Jean-Laurent Rosenthal）建立了一个战争和税收的模型，

用来分析近代早期欧洲不同国家为什么建立了不同的产权制度。

在他们看来，该模型在政治制度上有三重含义：（1）随着政治制度从独裁（autocracy）到专制（abosolutism）再到议会制度（parliamentary regimes），一个国家从事战争的意愿逐步减弱；（2）专制政体下的平均税收要低于独裁或议会制政府，因为专制主义政治严格限制财政敲诈；（3）在议会制度下，战争的净收益最高。议会制度能够保证一个国家只参与那些可以获益的战争上，它们一旦参战，就会给军队足以制胜的资源。

通过对近代早期欧洲战争和税收的分析，他们得出的最终结论是，经济增长快慢的关键并不在于税收水平，而在于边际税收效应（the effect of taxes at the margin）。因此，要促进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并不一定要减税，而应该特别关注边际税率和财政制度给经济发展造成的障碍。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社会的文化、政治和经济之间高度相关。这一理论认为，社会要么是“集体主义”的，要么是“个人主义”的。在集体主义社会里，每一个人主要与特定的宗教、种族或家族集团中的成员发生社会、经济方面的联系，社会结构是“分割的（segregated）”：其间的合同是通过“非正式”的经济、社会制度得以履行的；他们视合作与奉献为集团的福利；政府是非民主的。在个人主义社会里，不同集团的人们之间进行着经济交易，社会结构是“一体的（integrated）”；合同主要通过组织得以履行；自信、独立的个人主义被高度信奉；政府是民主的。在《经济、社会、政治和规范诸因素的相互关系与经济意义：中世纪后期两个社会的状况》一文中，A. 格雷夫（Avner Greif）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热那亚商人和马格里布商人在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差异进行了研究。热那亚商人信奉个人主义；而马格里布商人信奉集体主义。他们在各自的贸易发展中，贸易的范围、方式、对违约的惩罚等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别，因而他们各自的贸易效率不完全相同。正如格雷夫指出

的，这是一篇归纳性的文章，主要是对他此前许多观点的系统归纳。全文在对两个不同社会的基本情况进行简单介绍后，审视了文化、社会因素在制度选择中所起的作用；探讨了这些制度中生长出来的文化因素的社会、经济意义；检验了经济制度、文化与政治制度的相互关系；研究了有组织的发展如何形成不同轨迹；透视了不同经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文化意义；验证了相关命题。

通过对集体主义的马格里布商人和个人主义的热那亚商人的比较分析，他认为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制度具有不同的效率。集体主义制度在支持经济体内代理关系方面更有效率，只需较低成本的正式组织，可能有一个相对有效的团体内部道德和社会实施机制。但是，它限制了经济体间有效代理的形成，限制了个人创新精神，也不利于通过发展适当组织来进行“匿名”交易。个人主义制度虽然不限制经济体间的有效代理，能够促进组织的发展和支持“匿名”交易，但是它在支持经济体内关系方面缺乏效率，要求高成本的正式组织。

在此基础上，他得出了“制度变迁的轨迹具有路径依赖性”这个结论，并分析了三个相关因素：首先，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要素组成，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其次，组织发展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现有组织和制度影响着个人和社会对外生变化的反应，也决定着引进新组织的激励，换言之，以前的组织决定了今后制度和组织的发展；最后，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从热那亚商人社会最终取代了马格里布商人社会这一历史现实看，提出个人主义社会制度从长期看可能是有益的。

这篇文章从表面上看虽然属于经济史文章，但是提出的命题是比较制度学的。正如格雷夫自己总结的，为了区别于其他人的